



天津金融简史

主 编 ● 沈大年

副主编 ● 马秀玲
陈文生

南开大学出版社

529114



2 019 3076 8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

“七·五”规划重点课题之一

天津金融简史

主 编 沈大年
副 主 编 马秀玲 陈文生
编 著 者 马秀玲 沈大年
陈文生 何孝允 刘凤林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8·11

天津金融简史

主编 沈大年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牛家牌印刷厂印刷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375 插页2

字数: 195千字 印数: 1—1,500

ISBN 7-310-00168-0/F·25 定价: 4.50元

前 言

《天津金融简史》是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六·五”“七·五”规划重点课题之一。由天津南开大学金融系、天津财经学院金融系和经济研究所金融史教学人员和科研人员编写而成，是有关天津金融史的第一部专著。全书以解放后的40年的金融历史为重点，按经济发展过程作了系统的叙述，反映了天津金融历史发展的概貌。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前的历史，只用一章的篇幅作了简要的描绘。本书可供广大金融工作者、大专院校师生和国家机关干部学习参考之用。通过以史为鉴开展金融研究，将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银行管理水平起一定作用。

本书执笔人(按章节写作顺序)有马秀玲、沈大年、陈文生、何孝允、刘凤林诸同志。徐鸿昌同志参加了审稿。最后，经由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金融史研究会主任孙及民同志审定。

天津金融历史内容很丰富，涉及面也很广泛，限于作者参阅史料和写作水平，错误及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予以惠正。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工商银行天津市分行、农业银行天津市分行、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保险公司天津市分公司，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天津金融研究所等单位的大力协助和支持，特此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编 者

1988年5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解放前天津金融业状况	(1)
第一节 早期的金融机构	(2)
一、钱铺的兴起	(2)
二、票号的兴衰	(4)
三、典当业	(6)
第二节 天津银号的发展与衰落	(8)
一、天津银号的兴盛	(9)
二、沦陷期间,钱业的畸形繁荣	(13)
三、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货膨胀下,钱业日益衰落	(14)
第三节 外国银行在天津的活动	(16)
一、外国银行在津的建立与发展	(17)
二、外国银行在津的侵略活动	(22)
三、沦陷期间日本对天津金融的掠夺	(26)
四、抗战胜利后外国银行的变化	(27)
第四节 本国银行的发展与演变	(28)
一、兴起时期(1897—1911年)	(29)
二、发展时期(1912—1927年)	(30)
三、兴盛时期(1928—1937年)	(34)
四、沦陷区银行业的被摧残(1937—1945年)	(37)
五、恶性通货膨胀下,银行业的衰落(1945—1949年)	(38)
小结	(40)
第二章 解放初期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天津金融	

(1949.1.15—1952年)	(41)
第一节 整顿金融市场, 建立新的金融秩序	(42)
一、肃清伪币, 建立和巩固统一的人民币市场	(42)
二、接管官僚资本金融机构, 取缔帝国主义在华 金融机构的特权	(46)
三、整顿、管理、改造私营金融业	(47)
第二节 大力开展金融业务, 促进国民经济 的恢复和发展	(59)
一、运用紧缩的货币政策, 制止通货膨胀	(59)
二、全面开展对私业务	(64)
三、初步确立国家银行的三大中心地位	(68)
小结	(71)
第三章 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时期的天津金融 (1953—1957年)	(73)
第一节 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 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金融事业	(73)
一、广泛筹集社会资金, 扩大信贷资金来源	(74)
二、支持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	(75)
三、支持农业、手工业合作化	(77)
四、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80)
第二节 社会主义货币、信贷管理的正规化	(82)
一、建立正规的流动资金信贷管理体制	(82)
二、新人民币的发行	(88)
三、掌握货币流通规律, 有计划地调节货币流通	(92)
四、人民储蓄事业的发展	(96)
小结	(100)
第四章 第二个五年计划及其后三年调整时期的天津金融 (1958—1965年)	(102)
第一节 “大跃进”给天津金融带来的挫折	(103)

一、改变对企业流动资金的供应办法·····	(104)
二、适应财贸体制变化,改变银行农业信贷管理体制·····	(105)
三、城乡储蓄中的虚假现象·····	(106)
四、停办国内保险业务·····	(107)
第二节 调整初期的天津金融·····	(107)
一、恢复原来对国营工交企业流动资金供应办法·····	(108)
二、贯彻“银行六条”,管紧贷款,促进调整·····	(108)
第三节 调整后期的天津金融·····	(109)
一、改进银行管理体制·····	(110)
二、改变商业贷款管理办法·····	(110)
三、处理积压物资,搞活资金·····	(111)
四、有效地发放和使用农业贷款,整顿农村信用合作社·····	(112)
小结·····	(113)
第五章 十年动乱中的天津金融(1966—1976年)·····	(115)
第一节 政治风暴对天津金融战线的袭击·····	(115)
一、信贷资金被乱挪乱用,资金使用效益下降·····	(116)
二、裁并机构,金融体制支离破碎·····	(117)
第二节 天津金融的恢复生机与转折·····	(119)
一、第一次恢复生机的转折·····	(119)
二、天津金融第二次转机与挫折·····	(121)
小结·····	(122)
第六章 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金融事业(1977—1987年)·····	(124)
第一节 以中国人民银行为领导的金融体系的建立·····	(125)
一、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恢复和组建·····	(125)
二、中国人民银行职能的调整和中国工商银行 天津市分行的成立·····	(131)
第二节 金融管理体制的全面改革·····	(133)
一、改革信贷计划管理体制·····	(133)
二、改革利率制度·····	(136)
三、流动资金改由银行统一管理·····	(139)

四、扩大银行信贷活动领域	(140)
五、改革银行结算制度	(143)
六、开办金融信托业务	(145)
七、恢复和发展保险事业	(148)
八、改革银行内部经济核算	(151)
第三节 新时间的货币流通	(153)
一、货币流通规模迅速扩大	(153)
二、货币回笼与投放	(160)
三、货币流通量	(161)
四、采取措施,不断调节货币流通	(164)
第四节 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166)
一、千方百计抓储蓄	(166)
二、金融改革的新进展	(168)
三、金融工作的新成绩	(171)
小结	(173)
结束语	(175)
附录 天津市金融业单位简介	(177)

第一章 解放前天津金融业状况

天津在设卫之前，地名直沽，本为海滨荒地。自明永乐二年（1404年）设卫驻兵、建城，赐名天津。由于地处首都东大门，随着漕粮输运及芦盐的运销，促使天津贸易往来日益活跃，人口也逐渐增多。清代初年，天津已成为重要海口城市。1860年天津开为商埠，商业勃兴，对外贸易发达，金融业也随之发展。至解放前天津已发展成为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北方的金融中心。

天津金融业发展历史悠久，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解放前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不论在金融机构上和业务数量上在全国均占首位，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进行搜刮和掠夺的中心，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天津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金融中心，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统治，经济上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上海大同小异。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天津划分势力范围，利用租界为根据地，操纵天津的金融和对外贸易大权。

本国的金融业，一方面对帝国主义银行有一定的依附关系，一方面又由于长期处于封建帝制和北洋军阀统治中心，因而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

第一节 早期的金融机构

天津金融业发祥早，历史长，机构多。金融业的发展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商品流通的繁盛，必然带来货币流通的频繁。清代天津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主要是制钱、银锭和银元。各地来往客商携带银钱需要兑换、汇兑和保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对外贸易发展。“在外国购买货物的商人，就得用本国的铸币换成当地的铸币；和把当地铸币换成本国的铸币；甚至要把不同的铸币同作为世界货币的、未铸币的纯银或纯金相交换”。^①这就更增加了对货币经营业的需要。天津早期的金融机构有高利贷资本的典当业及经营货币业务的钱铺和票号。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金融机构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有的逐步没落，有的则几度兴衰。

一、钱铺的兴起

天津早期经营货币兑换的是个人设立的“兑钱摊”，也称“钱商”。以后逐渐发展为独资经营专门进行兑换的小型商号，间或有少量存放款业务，称之为“钱铺”、“钱局”或“钱号”。据说天津最早的钱局，开设于乾隆四十年间（1776年），在今估衣街、官南、官北大街一带。嘉庆时期（1796—1820年）在天后宫财神殿后院设有“钱号公所”，专门办理同业公共事宜。可见在此之前，天津钱业已相当活跃。最初还有一些商铺兼营货币兑换，如益兴珍、天兴恒首饰店、瑞蚨祥绸缎庄等，后来就划出一部分资本，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54页。

专营钱业。1853年（咸丰三年）天津出现了第一家银号——义恒银号。银号的业务，除兑换和存放款以外还发行钱帖和银帖。随着天津商业和进出口贸易的繁荣，银号数量增多，规模和业务范围也日益扩大。至1900年天津大小银号、钱铺已发展为300多家。^①“钱号公所”因原址不敷应用，于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由天后宫移至北马路，并改称“钱业公所”。1909年又改称“天津钱商公会”。1930年再改为“天津市钱业同业公会”。1937年最后改为“天津钱商业同业公会”。

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天津，百业摧残，钱业倒闭者约百余家。当时市面混乱，现银紧缺，钱业盲目提高贴水，竟至每千两加贴水三百数十两，引起物价上涨。直隶总督袁世凯为平抑物价，采取强制手段，设平市官钱局，取缔现银贴水，酿成天津钱业史上的“断银色”风潮，发行的银帖纷纷要求兑现，大量的钱庄因此而破产。至此，钱商业由原来300多家，骤减为30多家，是为天津钱业有史以来受到的一次大打击。庚子事变以后，市面稳定、钱业复兴，为了控制天津金融，袁世凯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立官办直隶省银号，也称天津官银号，总号设天津东北角。主要经营兑换和调节银钱比价，并吸收小额存款，提倡储蓄。宣统三年（1911年）一月，官银号又改组为直隶省银行。官银号的设立，在引导私营银号营业步入正规化方面起了一定作用。

在天津未开埠前，与钱铺同时存在的还有炉房。清中叶政府将熔化银两开放，准于民营，遂有“炉房”出现。炉房大宗生意是熔化碎银，铸成天津通用之行化宝银。因当时无公估局，故炉房兼鉴定银两。炉房对所铸之银锭负有无限责任。炉房利用业务之便利发行银锭票据流通市面和办理存放款，生意兴隆。在1900年庚子事变前夕，天津炉房发展达40余家，多设于宫北大街一带。

^① 刘学煦：《天津银号之既往、现在及将来》。

在“断银色”风潮中，发行的银锭流通券无法兑付，炉房倒闭了3/4，仅剩10余家勉强维持营业。后因银元银两并行，其营业日少，辛亥革命又遭官兵焚毁，遂一蹶不振，有的改为银号。

二、票号的兴衰

票号又称票庄，是清代重要的金融机构。它的主要业务是经营汇兑。中国汇兑起源于唐代“飞钱”。因当时商品流通尚未普遍，汇兑业务也未得到充分发展。清末商品经济发达，汇兑业务需要也日益迫切，故产生票号。

天津的票号，产生于清乾隆末年。当时，山西商人雷履泰在天津开设日升昌颜料铺，因需要到四川购买铜绿，颇感运输不便，乃在四川设分号，采取两地互相划拨办法，既节省了运现费用又可避免路途被盗危险。因此，其他商人也委托日升昌代为汇款。因得利丰厚，不数年日升昌盈余数10万两。嘉庆二年（1797年）正式成立日升昌票号，总号设在平遥，各省设立分号。^①票号营业兴盛，收取汇水，获利甚巨，在天津的山西商人也纷纷开设。自道光初年起，十数年间，成立的票号有17家。因多系山西人开设，故又称山西票号。由于总号所在地不同，又分为祁县、平遥、太谷三帮。票号早期活动主要侧重在北方。

天津开埠之后，钱业发展，各钱铺多吸揽票号之存款，以扩充业务，埠际贸易也赖票号为之调节。庚子事变前天津票号总号已达30余家，^②这段时期是票号的繁盛时期。

票号的主要业务是汇兑，也有兼营存放款者。1850至1867年间，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交通阻隔，票号代汇军饷、税收，取得清政府信任，为官吏垫支款项及代办捐官晋级补缺等项，直接参与了封建官僚经济剥削。由于票号依靠官府，从而获

① 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

② 王子健：《天津之银号》。

得了一个较大的发展时机。

钱铺产生虽早于票号，因资本小，又无分支机构，不具备承作汇兑条件。而票号资本十余万两至百余万两，分支机构伸向全国许多重要城市及海外。在新式银行未成立之前，票号已成为我国早期金融业中规模最大，势力最强的金融机构，繁盛了将近60年。它不仅加速了资金周转和商品流通，而且对促进国内外经济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票号是封建式金融机构，组织上的封建性和经营上的保守性都很浓厚，业务经营中重人不重法，放款重信用不重抵押，营业风险很大。票号完全实行封建家长式统治，管理经营上墨守陈规，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终于随清政府垮台而衰落。1902年成立天津官银号时，直隶总督袁世凯要求票号参加筹办；1904年清政府组织户部银行又邀请票号入股，均遭拒绝。1908年在天津的各票号负责人，联名向总庄申请改为银行，也遭到各总庄的反对。1911年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票号失去靠山，放款不能收回，公款存储被官银号和新式银行夺走。邮政局业务的发展，使票号汇兑业务骤然减少。在南方票号倒闭净尽，天津虽尚存十余家，但业务范围均已缩小。1921年在各家票号中贷款最多的天津日商平野洋行，因贩卖金丹鸦片犯案，经理携款潜逃，共倒帐80万元^①，损失巨大。最后，仅剩大德通、大德恒二家转为钱庄，结束了票号在天津的历史。

小汇兑庄是一种承汇小额汇款的金融机构。票号多承办厂家、商号或官府款项汇兑，其款数多为数百数千或数万两以上，而小汇兑庄，一般五元起码。汇兑庄规模小，业务简单，人员少；有的只有一、二名工作人员，多住于客栈或往来银号内，不悬招牌。汇兑庄始于光绪初年，出现在通商口岸和东北地区。因天津

^① 曲殿元：《中国之金融与汇兑》。

是重要港口城市，物资云集，来津谋生者日多，一些从事肩挑背负的劳动者，为寄钱养家糊口，需赖于小汇兑庄。1897年8月28日《申报》刊载《论中国通商各口宜多开小汇划庄以辅邮政之不逮》，提倡开小汇兑庄，文中提出“资本不需甚巨，用人不必甚多，既可免盗贼抢掠之虞，又可省山川阻滞之弊，推而广之，内地各处城镇市均可仿行，于是民生之计日益流通。”光绪卅一年（1905年）天津已有小汇兑庄26家（《天津商会档案》）。小汇兑庄的发生发展，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发展和某些人的生活需要，有其积极历史作用。后来由于邮政局的普遍设立和零星汇款业务的发展，小汇兑庄逐渐被淘汰，至民国初年则相继消沉。

三、典当业

典当业俗称当铺，它是以物品为抵押放款的高利贷资本。放款对象一般是小生产者 and 贫民，是消费性贷款。早期典质出现于南北朝，唐代已很发展，明清时规模扩大。天津典当业肇始何时，已无从考查，据了解，明代已经存在，清代发展较快，不仅经营放款，还接受存款。在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成立有津邑当行公所，负责管理典当行业同业事务。说明当时天津典当已有相当规模，并形成一种行业。1860年以后天津虽开为商埠，但工业发展毫无基础，人口增加快，消费增多，洋货大量倾销，小生产者破产，劳动人民生活贫困，不得不依靠借贷维持生产和生活，当铺营业得以发展。清中叶来津经商和开当铺的山西商人渐多，随着商业和金融业的逐渐繁荣，典当业也进入了兴旺时期。光绪年间天津典当业不算小型的质押店已有44家^①。天津的天聚当历史较久，创办于咸丰四年（1854年）。有的当铺营业范围不限于抵押放款，也兼兑换银钱，有的甚至还买卖军粮。清代还有官款存当

^① 《1936年银行年鉴》。

生息。更促进了这个行业的发展。

典当是一种高利贷资本，对典当者条件十分苛刻，并不择手段贪图厚利。一般是当物价值越小，取赎时间越短，利率越高。典当普通利率是月息三分（年息36%）。但在接当时一般按物品价值对半贷款，对旧衣物则按价值的三分之一。期满不赎，即算“当死”，衣物由当铺自行处理。在兑进兑出金银饰器时，则用两种衡器，欺骗顾客。旧天津的估衣街就是专门拍卖“当死”衣物的市场。由于当铺获利丰厚，官僚豪绅也纷纷开设当铺。

当铺营业季节性很强，有所谓春当秋赎。最盛时期是隆冬腊月。年关将届，贫民及手工业者纷纷向典当业贷款。正如清光绪年间张焘《津门杂记》中所叙“天津县属城乡，典当凡四十余家，每年冬有减利之则，由藩司出示，惠及贫民，……年例于仲冬十六日起，至年底为止，原利三分者，让作二分，原利二分者，让作一分五厘，在典当商所损无多，而贫民大为方便。一近腊月，则烂其盈门，柜上伙计，已有应接不暇之势，柜外人声鼎沸，纷如乱丝，从日出起直至日昃，迄无宁晷，至岁底数日，人数尤多，事情尤琐，大除夕，城乡当铺，一律不关闭，纷纭一夜，竟有守候终宵者，至元旦日出，人数始稀，……因一逾此日，利息如故矣。”充分反映了天津劳动人民的极端贫困，年关之际，不得不求助于典当，以解决燃眉之急。正由于广大贫民已饱受典当剥削之苦，从而也激起人们对典当业的极大愤慨，在清末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中，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数千贫民焚毁当铺20多家，天津当铺损失约500万两，仅剩下了20多家勉强营业。^①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官兵对典当抢劫敲诈勒索。北伐军逼近天津，军阀败走时当铺被扫荡一空，致使天津典当业一蹶不振。1928年局势趋于稳定，各业恢复，天津也渐形成为百万人以上的华北重要商埠。典当业也渐发展，豪绅大贾多投资当铺。

^① 《1936年银行年鉴》。

为了避免遭到抢劫，当铺多设在外国租界内。从全国看，1931年共有典当4500多家，北京、天津、广州、上海几大城市为最多。为增进同业公共利益，1930年在天津北马路成立了“天津典业同业公会”。1931至1932年两年间天津新设立的当铺有十家，典当营业由衰转盛。1934年呈准立案的同业会员为61家，未立案的27家，合计88家。^①

1937至1945年天津沦陷期间，伪币急剧贬值，典当业出入均使用货币，受贬值影响较重，一些当铺陆续停业。典当业又走向衰落。抗战胜利后，1946年2月7日典业同业公会奉令改组为“天津市典当业同业公会”，地址仍在北马路。据该会统计1947年9月天津共有典当43家，最大资本额为法币1000万元。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利息收入远落后于货币贬值，当铺亏损严重，营业实难维持。到年底就有20多家歇业。至解放前夕，有的转为委托店，有的申请停业，所剩无几。解放后停业清理，结束了在天津的这个古老的行业。

第二节 天津银号的发展与衰落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盛极一时的票号随之没落，官银钱号也被改组。北洋政府掌握政权以后，军阀混战，财政困难。政府靠借贷度日，金融业发展也起了很大变化。当时市面上的制钱渐被淘汰，银两在日常生活中被银元所替代，单纯经营兑换的钱铺大部分停业，新建银号增加，资本不断扩大；同时新式银行也已兴起，二者在金融市场上都已形成了一股势力。但在民国初年新式银行与银号相比势力尚属薄弱，不能与银号相竞争。银号从清代经历了北洋军阀时期、南京政府、敌伪统治和抗战胜利的几

^① 宓公干：《典当论》。

个历史时期，没有被外商银行挤垮，也没有被新式银行所代替，其重要原因是银号适应了中国社会客观发展的需要，从而能在社会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天津是北方重要商埠，是各帝国主义激烈争夺的经济中心，它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势力压迫，另一方面又受到封建势力的摧残，民族工商业得不到正常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小规模的商业资本比较活跃，一些前资本主义的旧习惯、旧传统、旧制度依然存在，这就形成了旧式金融机构——银号能和新式银行并存并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银号投靠外商银行，充当外商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工具，大大地助长了银号的买办性和封建性。同时，也影响着银号业务始终不能向近代化方向发展。

天津银号在各个时期机构数量的发展变化情况如下：

年份	1911 清末	1927	1935	1937.7 抗战前	1941	1945.8	1946	1948.12
家数	8	30	142	94	195	103	165	111

一、天津银号的兴盛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暂时发展，新式银行和钱业也活跃起来。大战之后，帝国主义廉价商品又大量侵入我国内地和农村，加以内战的影响，致使农村经济日益枯竭，现金大量流入城市。各方资金也不断汇集天津，天津商业资本和一些大地主投资钱庄很多，封建官僚，军阀等也多携款来津，藏身租界，开设银行和钱庄、银号。故银钱业发展迅速。至1927年天津的银号数量已从清末的8家发展为30多家。如冯国璋开设的华实银号，陈光远开设的德丰银号，阎锡山开设的亨记银号，王占元开设的颐和、致昌银号，都是独家经营，资力雄厚，具有较高的信誉和吸引力，营业极为